

大航海時代初期歐洲的東亞觀

華 濤*

15世紀末，世界進入了大航海時代。這個時代的開始以迪亞斯到達非洲南端為標誌，以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最為轟動，而當時人們同樣關注的還有1497-1498年達伽馬繞過非洲南端到達印度的航行和1519年麥哲倫進行的環球航行。所有這些航行都是當時歐洲人探求從歐洲通往歐亞大陸東部地區新航路努力的一部分，但當時的歐洲人對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卻有兩種不同的地理認識。一個代表是葡萄牙人沿非洲西海岸向南的航海活動，另一個代表是西班牙人橫跨大西洋的西向航海活動。這兩種地理認識和兩個方向的航海活動表現出大航海時代初期歐洲人複雜的東亞觀。

葡萄牙人當時的航海活動與葡萄牙國王若昂二世有密切的關係。葡萄牙的航海活動在亨利克王子時代一度非常活躍，在當時歐洲特別是利比里亞半島非常突出。但是1460年亨利克王子去世後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動一度停滯，因為葡萄牙國王堂·阿豐索五世（1438-1481年在位）與他的兄弟、亨利克王子的養子和繼承人堂·費爾南多王子之間明爭暗鬥，並且在海外活動的目標上也有矛盾。⁽¹⁾亨利克王子在世時的航海目標主要是非洲南端，與亞洲沒有關係。⁽²⁾1471年國王讓王儲、未來的堂·若昂二世負責海外活動，1474年王儲又完全掌管起非洲幾內亞的事務。當時葡萄牙與西班牙爭奪在非洲西海岸的航行和非洲西部貿易的權力，並為此發生了公開的戰爭。最後雙方達成《阿爾卡薩瓦斯條約》（Treaty of Alcáçovas），葡萄牙國王和王儲承認西班牙對已經佔有和將要佔有的加那利群島擁有所有權，西班牙則承認葡萄牙在大西洋航行及前往幾內亞海岸和米納從事貿易活動的專屬權，並且允諾在沒有得到堂·阿豐索五世或其兒子若昂王儲許可的情況下，禁止其王國的公民和居住在國內的外國公民前往葡

牙所屬的地區和島嶼從事貿易活動，其中包括馬德拉群島、亞速爾群島、佛得角群島、幾內亞地區，以及葡萄牙發現或者征服的由加那利群島至幾內亞南端的所有地區。⁽³⁾如果從以後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劃分全球的《托德西利亞條約》（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看，這次協定不僅對葡萄牙人壟斷東方貿易有重要意義，而且也表現出葡萄牙人追求的目標：繞過非洲南端東航亞洲。

1481年葡萄牙國王若昂二世即位以後，葡萄牙的航海活動得到了新的推動。他首先派船隊繼續向非洲西海岸南端航行，並於1482年初在非洲西海岸建造米納要塞，建立起葡萄牙人向非洲內地發展的重要立足點。與此同時，若昂二世命令迪奧戈·卡奧繼續對西非海岸進行有計劃的發現。1482-1484年間，卡奧到達了剛果河口和聖奧古斯丁角。堂·若昂二世對卡奧帶回的消息興奮不已，並命令他1485年夏再次向南航行。1485-1486年卡奧前進到十字角和黑人角。當時卡奧認為自己的船隊到達了非洲南端，並向國王作了彙報，而葡萄牙國王轉向教皇通報說“葡萄牙人已經站在了印度的大門口”⁽⁴⁾。

* 華濤（1952-），歷史學博士，現任南京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中外關係史博導。本文為作者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第8屆（2000-2001年度）學術研究獎學金提交的論文之一。

但是進一步的航行很快表明，非洲大陸在普拉索角這樣的緯度繼續向南伸延⁽⁵⁾，繞過非洲南端的可能沒有實現。但是當時葡萄牙人對非洲大陸南端已經有了基本信念，相信1457年他們從弗拉·毛羅地圖上獲得的可以繞過非洲南端東航印度的知識的正確⁽⁶⁾，所以若昂二世構思了新的計劃：一方面派巴托洛梅烏·迪亞斯繼續向非洲南端航行，另一方面派佩羅·達科維良從陸路經過開羅和紅海，乘坐阿拉伯人的船隻前往印度。⁽⁷⁾達科維良後來對神父的懺悔清楚地說明了若昂二世當時的想法：“從柏柏爾回到葡萄牙後，國王秘密召見了我，對我說希望我能為他做一番大事業，因為他認為我是一個忠實能幹的侍從，能夠順利地建功立業；這項任務就是讓我和一位叫阿豐索·德派瓦的同伴去發現瞭解約翰長老國王及肉桂和其它香料的產地，這些東西是從哪兒出發通過摩爾人的地域到達威尼斯的……”⁽⁸⁾

迪亞斯於1487年8月啟程向南航行，1488年1月6日被風暴刮離海岸，繼續向南航行，數日不見陸地，折回向北航行才於2月3日重見陸地，實際上已經繞過非洲南端到達了非洲東海岸。船隊繼續向北航行，到達了今天的阿爾戈阿灣和大菲什河口。這時已經可以肯定由海路可以到達印度，加上不願意繼續前進，他便向南航行，並於1488年5月見到並繞過了非洲南端的海峽，回到葡萄牙。⁽⁹⁾

迪亞斯繞過好望角的航行在當時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因為這是葡萄牙人一個世紀以來沿着非洲西岸航海的目標所在，也是他們在15世紀中期得到弗拉·毛羅地圖後的信仰所在。現在他們終於可以自豪地宣佈自己的地理觀念的正確。但對於我們的研究而言，和迪亞斯同時被國王派出的達科維良的東方之旅，可能意義更加重大。

達科維良和他的同伴德派瓦於1488年春天離開開羅，並於4月或5月間穿過蘇伊士地區。達科維良乘船沿紅海南下，到達亞丁，再轉乘阿拉伯人的船，到達印度古里，然後又轉往果阿，並去了霍爾木茲。這樣，“他已經對主要的香料貿易中心和各個產品的產地—馬拉巴爾、錫蘭和馬魯古群島—及

運輸這些產品到亞歷山大的航線了如指掌。在霍爾木茲，他看到了阿拉伯人另外一個大型貿易集市，並瞭解了聯繫該地和東方各港口之間的航線。”⁽¹⁰⁾達科維良在返回途中在澤拉下船上岸，然後沿着非洲東部海岸經過莫加多喬、馬林迪和莫桑比克，最後到達索法拉（南緯20度）。返回開羅後，達科維良見到了葡萄牙國王派來的使者，請他們將自己的信件帶回葡萄牙，報告在印度和非洲東海岸的見聞，其中包括他在索法拉從一些阿拉伯水手等人那裡瞭解到的知識：“沿着這邊的海岸可以航行到西海岸，但誰也不知道何處是盡頭。”⁽¹¹⁾達科維良的這份秘密報告沒有能夠流傳下來，所以我們不知道達科維良有沒有談到亞洲東部包括中國的情況。按理說，當時在古里和霍爾木茲活動的商人中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人，即使沒有遇到中國商人，他也應該聽說許多商品來自亞洲東部的大國。不過當時葡萄牙一方面全力以赴地組織人力去發現前往東方的道路，另一方面又精心保守秘密，不讓外人特別是西班牙和意大利人瞭解東方的情況，我們沒有在歷史記錄中看到關於達科維良報告的詳細記錄，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達科維良的航行和迪亞斯的航行一樣，為葡萄牙人瞭解東方，瞭解前往東方的道路，奠定了基礎。15世紀末達伽瑪的航行就是建立在他們獲得的知識之上的。

在迪亞斯到達非洲西南端和達科維良前往印度的同時，橫跨大西洋西航亞洲的活動也在進行。當時橫跨大西洋西航亞洲的計劃是建立在一種錯誤的想法上的，即從歐洲西航到達遠東的距離並不很遠。這主要是因為那個時代的人對地球大小的估計過小有關。⁽¹²⁾自古希臘至哥倫布時代，測量地球大小的資料很多。古希臘埃拉托色尼測定地球的大小是252,000斯塔季亞（希臘里），這與實際大小約40,000公里是很接近的。但更多的資料是偏小或嚴重偏小。哥倫布廣泛搜集地球大小資料和有關理論後，深信較小的地球資料，他綜合得出的資料是由加那利群島到日本島是2,400海里，到中國是3,550

海里，而實際上空間直線距離分別為 10,600 海里和 11,766 海里。⁽¹³⁾ 15 世紀意大利著名地理學家托斯卡內利 (Paolo da Pozzi Toscanelli) 也支持偏小的觀點。1474 年托斯卡內利在給哥倫布的信中說：

上次我和你說過關於一條去香料產地的海路，一條比你所採用的去幾內亞的航道更短的海路。現在最尊敬的國王要我作些說明，讓這條海路為一般人、甚至很少受教育的人都能明白理解。

雖然我知道在像地球這樣一個球狀體上，這一定能做到，但為了求得明確，避免困難，我還決定像在航海圖上那樣來標出（這條路線）。

為此，我正在為國王陛下送去一幅我親手畫的航海圖，其中標明了你將從此啟航西行的海岸和島嶼，以及一路上你將要遇到的地方，還有你應偏離極地或赤道多遠，並在航行了多少路程，即在航行了多少英里以後，你就能到達這塊盛產香料和寶石的最富庶的地方。我稱這塊盛產香料的地區為“西方”，雖然它們通常被稱為“東方”，這一點你不應該感到吃驚，因為那些在另一個半球裡航海的人，是經常在西方找這些地區的。但是，如果你從陸上走，走較長的陸路，我們就祇能向東方去尋找這些地方了。

因此，在海圖上垂直地畫的直線指明了從東向西的距離；但水平地畫的直線則表示了從南向北的的間隔。

從里斯本城以直線向西到非常高貴而輝煌的 Quinsay 城，圖上指明有 26 里格，每一里格是 250 英里。（此城）周圍達 100 英里，有十座橋樑。城的名稱的含義是“天府”；對於這個城市及其工藝與財寶的眾多，有很多奇蹟般的傳說。它（指中國）擁有整個地球約三分之一的面積。此城位於 Katay 省內，那是這個國家的皇室駐地。

但是從你所知的安的利亞 (Antilia) 島到遠近聞名的 Cippangu 島 (日本)，有 10 里格。

這個島盛產金、珠和寶石；他們用純金來做寺院和皇宮的屋頂。因此在未曾探明的海洋上航行的路程是不遠的。我可以更為明確地提供更詳細的情況，但是一個勤奮的讀者已能從這裡自己推斷出其餘的一切了。⁽¹⁴⁾

哥倫布出生於僑居熱那亞的西班牙猶太人家庭，14 歲開始海上生活，1476 年到葡萄牙，六年後他首先向葡萄牙國王若昂二世提交了自己橫跨大西洋航行亞洲的計劃，爭取支持。但他的計劃在國王的一個專業委員會審查中沒有通過。實際上雖然葡萄牙人當時最關注的是繞過非洲南端東航亞洲，但他們也不願放棄任何到達亞洲的可能。在否定哥倫布的計劃之後，葡萄牙國王秘密派人率領一支艦隊按照哥倫布的計劃向西航行，但沒有成功。這件事情使哥倫布非常惱火，於是他離開葡萄牙，轉向西班牙，並最終得到西班牙國王的支持。

1492 年 8 月 3 日，哥倫布在西班牙國王的支持下，率艦隊西航。經過在大西洋上的艱難曲折，10 月 12 日登上了巴哈馬群島的瓜納哈尼島，1493 年初返回西班牙。哥倫布成功地西航和返回，不僅帶回了許多黃金，還帶回了幾個歐洲人從未見過的土著居民和許多奇花異草、珍禽翎毛。他當時認為自己向西航行的目的地是印度，最後到達的也是印度，他將自己遇見的和帶回的土著居民當作印度人。這個印度是當時歐洲人對亞洲南部和東部的通稱。⁽¹⁵⁾ 他在回航途中寫給西班牙國王的信說明了印度是他航行的目標和結果：

自從兩位殿下結束了摩爾人戰爭以後，……由於我向殿下們提供的關於印度土地和一位稱為大可汗（在我們卡斯蒂利亞語中意為“諸王之王”）的國君的情況，由於這位國君和他的前任曾多次遣人去羅馬，要求通曉我們神聖信仰的神學家去向他傳授，而教皇一直未予提供，結果許多臣民迷失路途，陷入了偶像崇拜，接受了墮落的教派，兩位殿下作為信

仰基督的國王、熱愛基督教神聖信仰的君主、該信仰的推進者、伊斯蘭教以及一切偶像崇拜和異教的敵人，想到派我——克里斯托瓦爾·哥倫布到上述印度地方，去看看上述君主、臣民、土地以及一切事務的狀況，並瞭解可用來使那些地方改變信仰的方式……（於是）兩位殿下命我率領足以使我到達上述印度地方的艦隊……遠涉大洋到達印度……向那些君主呈遞兩位殿下的國書，完成你們賦予我的使命……⁽¹⁶⁾

哥倫布到達“印度”震動了全世界，特別是葡萄牙的君主。早在1452-1456年，教皇曾經授予葡萄牙在東方進行大發現和傳教的權力，1479年西班牙承認了這一權力。但是哥倫布返航之後，西班牙君主立刻與教皇聯絡，爭取教皇授予某種發現的權力，並得到這位西班牙出生的教皇的支持。1493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向西班牙君主頒佈教諭，授予西班牙君主對他已經發現和將要發現的陸地“與西方相對應的陸地和在海洋上的陸地”的主權。這份教諭引起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的爭執，雙方在托德西利亞艱苦談判，並於1494年簽訂《托德西利亞條約》。根據條約，在佛得角群島以西370里格處劃線（子午線），西班牙將在這條線以西活動並擁有無可爭辯的權利，而葡萄牙人將在這條線以東活動並擁有無可爭辯的權利。⁽¹⁷⁾

這份條約的有趣之處在於它反映出葡萄牙人內心的地理觀念。實際上他們懷疑哥倫布西航確實到達了“印度”。他們仍然堅持自己的繞過非洲南端東航亞洲的想法。所以當時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爭論的不是要西班牙人放棄西航的權利，而是爭取將分界線移向更西之處。⁽¹⁸⁾葡萄牙人關於整個地球大小的看法，特別是關於歐亞大陸東端的整體看法，顯然是正確的。這種基本地理觀念的正確，反映出葡萄牙人在地理學方面走在歐洲的前列。

1494年《托德西利亞條約》之後，葡萄牙人積極準備自己的東方航行。1497年葡萄牙國王派瓦斯科·達伽瑪率艦隊繞非洲南端東航“印度”。達伽瑪的

航行和迪亞斯一樣，避開了北流的強大的本哥拉洋流和赤道以南沿岸的頂頭風，他在大西洋中繞了一個大圈子，然後在厄加勒斯角的緯度上轉向東航。⁽¹⁹⁾他接着沿非洲東岸，向北航行到莫桑比克。達伽瑪在馬林迪得到當地穆斯林君主的幫助，因為馬林迪與莫桑比克人敵對。馬林迪人甚至為達伽瑪提供了一位經驗豐富的阿拉伯水手伊本·馬吉德。在伊本·馬吉德的領航下，葡萄牙的艦隊順利越過印度洋，於1498年5月到達印度西海岸。達伽瑪的艦隊於1499年回到葡萄牙。馬吉多維奇說：

對於歐洲來說，通往印度航線的發現不僅是葡萄牙歷史上一個偉大的事件，而且也是世界貿易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從這個時刻開始直到蘇伊士運河開鑿之前（1869），歐洲與印度洋沿岸各國以及中國的主要商業貿易，都是通過地中海、穿過大西洋和繞過好望角來進行的。葡萄牙把“東航的鑰匙”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了16世紀最強大的海上王國，它奪取了對南亞和東亞貿易的壟斷權，並保持了九十年之久，直到“這個無敵於天下的艦隊”被打敗（1588）為止。⁽²⁰⁾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西航主張的擁護者西班牙，還是東航主張的支持者葡萄牙，當時歐洲人對東亞的認識都相當原始，他們的東亞觀仍然建立在馬可波羅時代的知識上。哥倫布對自己的計劃的描寫和到達美洲後向西班牙國王的報告，是這種東亞觀的突出表現。

哥倫布出發之前，西班牙國王發給他一張護照，護照言簡意賅用拉丁文寫着：“國王已派他率領三艘輕快帆船開往印度地區（*ad parte Indiae*）。”同時還給他頒發國書，一式三份，一份給中國皇帝“大汗”，兩封空白函準備在到達某國時按當地國王名銜填寫。⁽²¹⁾

哥倫布到達古巴之前從當地土著那裡聽說前往“古巴納罕（Cubanacan）有四天路程。納罕在土著

人口語中指“中部”，意思是到古巴中部有四天路程。哥倫布一行人中沒有懂當地語言的，哥倫布於是認為他們提到的是蒙古皇帝忽必烈汗，並進一步認為古巴就是亞洲大陸，而自己的目的地蠻子省和中國，應該不遠了。⁽²²⁾ 到達古巴後，他認為自己直接到達了中國海岸，古巴就是中國的“蠻子省”。⁽²³⁾

哥倫布關於東亞的知識，與當時其他人的知識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差別。但是葡萄牙人到達亞洲和他們在亞洲的活動，對當時歐洲的東亞觀開始產生革命性的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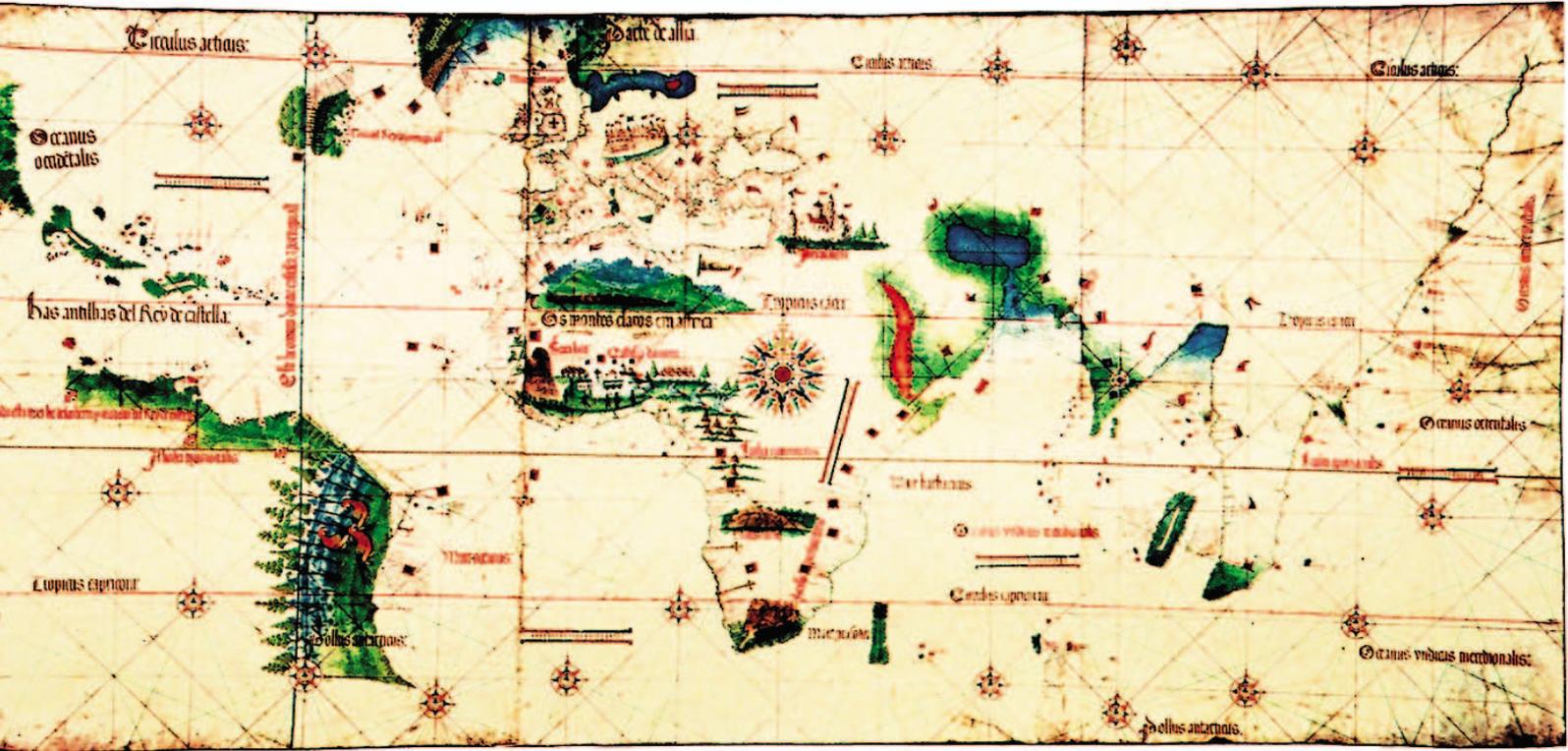
早在1500年，達伽瑪的航行就被胡安·德拉科薩（Juan de la Cosa）記錄進自己的世界地圖裡。德拉科薩曾擔任哥倫布的舵手，航海知識豐富。他的地圖中印度的形狀截短了一段，東南亞出現兩個過長的半島，並且托勒密地圖中的大中國灣又再現出來。但在印度之上有一段文字，說明印度是葡萄牙人發現的。到1502年所謂的“King-Hamy-Huntingdon Chart”，東方知識反應得更加清楚明確。例如古里已經清楚地畫在了印度西海岸。⁽²⁴⁾

進一步表現出葡萄牙人對亞洲的瞭解的是1502年完成的著名的坎迪諾球形平面圖（Cantino Planisphere）。這幅圖現存於意大利莫德納的Estense圖書館。⁽²⁵⁾ 坎迪諾圖的名稱來自於圖左下角背面的一段話：“Carta da nauigar per le Isole nouam^{le}. tr... in le parte de l'India: dono Alberto Cantino Al S. Duca Hercole” 這個Alberto Cantino是意大利費拉拉公爵的Ercole d'Este的密探，不止一次被派往當時因為東航印度而轟動世界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搜集葡萄牙人海外航行的情報。他裝扮成一位馬商，在里斯本花重金賄賂了一位葡萄牙地圖家，為自己畫了一幅世界地圖。當時葡萄牙有一幅高度機密的官方世界地圖Padrao，每當葡萄牙人在海外航行回國後，政府即將所得到的地理情報，繪製進該圖。坎迪諾得到的地圖至少部分複製了葡萄牙的這種官方世界地圖。1502年11月他將地圖秘密送往Ercole d'Este，同月19日他在羅馬寫信報告上級說，該圖已經從熱那亞送出，並補充說：

“la carta e di tal sorte, et spero che in tal maniera piacera a V. Ex.”⁽²⁶⁾

這幅坎迪諾彩色地圖⁽²⁷⁾在近代被發現時⁽²⁸⁾保存得相當完好，僅僅是圖上部邊緣可能被切割了。圖上顯示在15世紀末的幾十年中歐洲特別是葡萄牙的航海成果，包括1492年〈托德西利亞條約〉規定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劃分全球的分界線。雖然地圖並沒有標注日期，但它的完成日期仍然可以比較準確地確定，因為圖上的阿森松島（Ascension I.）是若昂·達·諾瓦（João da Nova）在1501-1502年間遠航印度之中發現的，發現的消息於1502年9月13日送達里斯本。坎迪諾於當年10月底帶離里斯本的地圖上已經有了阿森松島，說明該圖完成於1502年9-10月之間。⁽²⁹⁾ 雖然不少學者認為坎迪諾圖是意大利人的作品，但它應該是出自葡萄牙地圖家之手，根據柯爾特桑和特謝拉·達莫塔的觀點，這個葡人可能在政府中任職，而且很可能任職於當時保存海圖的政府機構 Armazem (repository) da Guine e Indias。⁽³⁰⁾

坎迪諾圖上畫上了許多最新的葡萄牙人航海所得的資訊，特別是關於遠東和極西地區的資訊。柯爾特桑和特謝拉·達莫塔認為，“就整個東方而言，托勒密的影響在波斯灣的畫法上和一些地名上已經非常不明顯，而大海灣（Magnus Sinus）則已經完全消失。印度半島表現得相當不錯，但馬來半島則向南伸展了許多，蘇門答臘島和馬達加斯加島的位置也不正確。亞洲的畫法必定基本來自阿拉伯材料，坎迪諾圖在地名法和不同地點用英寸表達的恒星高度度量上，都明確表現出那種影響。”⁽³¹⁾ 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始終沒有在意，雖然此圖上亞洲東部已經完全不同與托勒密的框架，亞洲大陸以東不再由一個封閉的大陸所環繞，而是一個敞開的大洋，但此圖在東亞大陸，也就是中國大陸的海岸線的頂端，畫有一條很短的向東方的海岸線。這條海岸線雖然不長，但似乎意味着作者尚未完全摒棄，或者他尚不敢完全放棄托勒密的學說。葡人當時的東方航行還沒有越過印度次大陸，他們關於東方的知識還相當有限。



坎迪諾地圖（作者不詳，約繪製於1502年）轉引自 Armando Cortesão and Avelino Teixeira da Mota,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6 vols, Lisbon, 1960-1962), vol. I, 圖4（彩色單頁）



Caveri地圖（Nicolaus de Caverio，約繪製於1505年前後）轉引自 Monique de la Roncière et Michel Mollat du Jourdin, *Les portulans: Cartes marines du XIII au XVII siècle*, Office du Livre S.A., Fribourg (Suisse) 1984（圖26）

除了宏觀認識之外，地圖上南亞、東南亞和東亞的一些說明⁽³²⁾也值得注意——

在馬六甲附近：“馬六甲，這座城市的商品都是運往古里的，也就是說，丁香、安息香、沉香和檀香，大黃和象牙，非常貴重的寶石，珍珠，麝香，上好的瓷器等等其他物品，大部分商品都是外來的，從中國的沿海一帶來的。”在暹羅灣附近沿着河流：“大府城（*Cerener: Ayuthia?*），前面提到的商品這裡都有。”在東埔寨海角附近：“這是軍突弄山（*Fullucandora* 角）距離此處以北 3 英寸。”在東埔寨附近：“*Champocachim* 位於 6 英寸以北，這裡有紫膠、安息香、巴西木、檀香木、麝香木、沉香木和前面談到的其它商品。”更北在中南半島海岸一帶：“*Chochin-China* 在此以北 10 英寸。”再往北，在中國海岸一帶：“*Menorte* 島，位於 15 英寸半以北，有安息香、沉香、紫膠、絲綢、麝香。”“*C. Mamcametora* 位於 15 英寸以北。”圖上最後一個說明是上述地區以北：“*Quiritiria* 位於 19 英寸以北。*Quiritiria* 這裡有許多絲綢、石蠟（*wax*）、麝香、安息香（*benzoin*）、蘇合香（*storax*）、紅寶石（*ruby*）和許多其它各種各樣的寶石。”

圖上的這些說明，我們似曾見過。仔細想一想，《諸蕃志》、《島夷志略》等等中國史籍中的記載似乎與這裡有某種相像。不過圖上提到的遠東的地名和關於遠東的說明，表明當時歐洲人對東方的知識尚少。改變這種局面必須依靠親身生活的經歷和根據親身經歷而向歐洲傳達的知識。

與坎迪諾地圖同源或者就是根據坎迪諾地圖畫出的 *Caveri* 地圖，圖幅大小為 46 x 90 inches (1150 x 2250mm)，是 19 世紀在巴黎的 *Archives du Service Hydrographique de la Marine* 發現的。圖上沒有日期，但根據地圖上美洲的一些地名不見於坎迪諾地圖，並且也沒有 1505 年以後發現的地點名稱，學者們估計它很可能繪製於 1505 年前後，至少是 1502-1504 年間的作品。⁽³³⁾ 此幅地圖的左角標注

有 “*opus Nicolay de Caveri Januensis*”（熱那亞人 *Nicolay de Caveri* 的作品）字樣，所以被稱為 *Caveri* 地圖。⁽³⁴⁾ 但圖上的說明都是葡萄牙文，所以學者大多認為這是一幅葡萄牙人繪製的地圖。

與坎迪諾地圖相比，*Caveri* 地圖上有一些顯著的變化，如地圖左邊緣標注的緯度刻度，這種刻度加上 13 世紀以來航海圖上的羅盤指標，預示了歐洲人利用阿拉伯人天文航海術而擴大自己航海範圍的新時代。就亞洲而言，印度次大陸不僅形狀已經更加準確，而且海岸上一些達伽瑪訪問過的地點也已經準確定位。馬來半島和蘇門答刺的形狀和位置與坎迪諾地圖一樣，尚不正確，但亞洲內陸地區標注了一些地名，如恆河印度（*India Exgagem*）、上印度（*India Superior*）、韃靼里亞（*Tartaria*）和契丹（*Cataio*）等。⁽³⁵⁾ 其中韃靼里亞（*Tartaria*）標注在羅斯以西，並注明是“大汗”所在地。在遠東大陸東北的海上有一個稱為“*Cingirina*”的島嶼，旁邊注明“這個島很富有，從這裡向馬六甲出口瓷器。該地出產安息香、蘆薈和麝香。”這個島嶼很可能是日本。上印度（*India superior*）標注在東亞大陸的南部，靠海岸；契丹（*Cataio*）標注在地圖的右上角、東亞大陸的北端，靠海。雖然圖上沒有出現“塞里絲”字樣（也可能是我使用的圖幅太小無法辨認），但在從契丹標注在遠東大陸北部頂端這點看，尚不能認為當時葡萄牙人已經對遠東有了比較清楚的地理認識，他們尚未到達東南亞，對東南亞的瞭解尚且不多，對遠東的知識就更少得可憐，契丹和上印度之間的大片空地就是他們知識空白的證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坎迪諾地圖東北角向東伸展的短短的海岸不僅在 *Caveri* 地圖上仍然存在，而且畫得更加明確，這可能表示 *Caveri* 地圖的作者和坎迪諾地圖的作者一樣，尚不敢絕對否認托勒密地圖中的大中國灣和東亞大陸對大中國灣的環繞。對東亞的明確認識，還有待葡萄牙人抵達東亞後的親身經歷。

【註】

- (1) 參閱雅依梅·柯爾特桑 (Jaime Cortesão)《葡萄牙的發現》(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鄧蘭珍漢譯，中國對外翻譯公司，1996-1997 (以下簡稱《發現》)，第四部分〈堂·若昂二世及通往印度航海路線的發現〉中的第1章《若昂前時期》，頁 643-647。
- (2) Pierre Chaunu, *European Expans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Amsterdam, 1979, p. 63. 轉引自王加豐《“地理大發現”的雙重背景》；黃邦和、薩那、林被甸主編，《通向現代世界的500年—哥倫布以來東西兩半球匯合的世界影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 41。
- (3) 《發現》，頁 758-759。
- (4) 這一段轉述見《發現》，第四部份第6章《迪奧戈·卡奧的航行和印度計劃》。
- (5) 關於迪奧戈·卡奧的結局，有各種不同的記載和解釋。特謝拉·達莫塔認為因為後來的航行證明他的報告根本錯誤，非常失望的國王堂·若昂二世將他流放它鄉，並從史書中將他的名字一筆勾銷。參閱《發現》，頁 807-811。
- (6) 從若昂二世後來派懂得阿拉伯語的人經過埃及前往印度的舉動看，葡萄牙人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地理知識。參閱《發現》頁 810-811，關於弗拉·毛羅地圖與阿拉伯人的關係的討論和頁 831-834，關於佩羅·達科維良會不會說阿拉伯語的討論。
- (7) 《發現》，頁 812。
- (8) 轉引自《發現》，頁 834，但我重譯了其中幾個名詞。
- (9) 中文版《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迪亞斯”條。
- (10) 《發現》，頁 844。
- (11) 《發現》，頁 848。關於達科維良的東方之行還可參見馬吉多維奇《世界探險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頁 131-133。
- (12) 關於哥倫布的地理思想，參見詹姆斯《地理學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 87-89；宋正海、李天瑞《地理大發現後地球經度的測定》；黃邦和、薩那、林被甸主編，《通向現代世界的500年—哥倫布以來東西兩半球匯合的世界影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馬吉多維奇《世界探險史》，頁 142-144等。下面這段敘述主要參用宋正海、李天瑞的文章。
- (13) 宋正海、李天瑞，上引文，頁 117。
- (14) 全文引自詹姆斯《地理學思想史》，頁 76-77。關於托斯卡內利是否與哥倫布發生過關係的討論，參見馬吉多維奇《世界探險史》，頁 142-144。馬吉多維奇認為至少有一定的關係。
- (15) 馬吉多維奇《世界探險史》，頁 149。
- (16) 轉引自古斯塔沃·巴爾加斯·馬丁內斯《哥倫布對中國的所謂“發現”》，(黃邦和、薩那、林被甸主編，《通向現代世界的500年—哥倫布以來東西兩半球匯合的世界影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 135-136)。
- (17) 關於《托德西亞條約》的簽署和內容，參見詹姆斯《地理學思想史》，頁 89-91；馬吉多維奇《世界探險史》，頁 159-162。這裡是簡化的描述。
- (18)(20) 馬吉多維奇《世界探險史》，頁 161；頁 232。
- (19) 詹姆斯《地理學思想史》，頁 85。
- (21)(22)(23) 莫里遜《航海家哥倫布》，頁 36；頁 77注(6)；頁 68。
- (24) 關於胡安·德拉科薩的地圖和“King-Hamy-Huntingdon Chart”的情況，轉引自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vol. I, book I, p. 219.
- (25) Este 是意大利中世紀著名家族，曾經是費拉拉 (Ferrara, 13-16世紀) 和摩德納及勒佐 (Modena and Reggio, 13-18世紀) 的地方統治者 (governors)，並曾經保護過詩人阿里奧斯托 (Ludovico Ariosto) 和塔索 (Torquato Tasso)。
- (26) 關於這幅著名地圖的介紹很多，這裡主要使用《地圖集》，vol. I, p. 7.
- (27) 《地圖集》，vol. I, 圖。
- (28) 1873年 Giuseppe Boni 第一次提到這幅地圖，參見《地圖集》，vol. I, p. 8.
- (29) 見《地圖集》，vol. I, p. 8.
- (30) 柯爾特桑和特謝拉·達莫塔支援 Duarte Leite 1923年提出的觀點，根據圖上地名基本上是葡萄牙化的寫法，認為該圖應該是出自葡萄牙人之手。參閱《地圖集》，vol. I, pp. 8-9.
- (31) 《地圖集》，vol. I, p. 9。另參考 Lach, vol. I, book I, p. 219.
- (32) 以下說明均見《地圖集》，vol. I, p. 13.
- (33) 該圖圖幅和內容介紹，見 Monique de La Roncière et Michel Mollat du Jourdin, *Les portulans: Cartes marines du XIII au XVII siècle*, Office du Livre S.A., Fribourg (Suisse) 1984 (圖 26)。
- (34) 早先左下角的標注被解讀為“Canerio”，所以被稱為“Canerio 地圖”
- (35) Lach, vol. I, book one, p. 219, note 318.